

路线斗争学习资料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路线斗争学习资料

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呼和浩特

333. 1
864
5 8 3 3



路线斗争学习资料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1972年4月第一版·1972年6月第二版

1972年6月第一次印刷

每册：0.10元

下

目 录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分裂主义的罪魁	薛 迅(1)
陈独秀右倾分裂阴谋的破产	史 锋(5)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可耻失败	史正群(8)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破产	郑 滨(12)
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的垮台	晓 斌(16)
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史 锋(18)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破产	史 锋(22)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史 锋(27)
彭德怀反党集团罪恶阴谋的破产	洪施炳(30)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35)
托派头子托洛茨基	廖大力、廖师文(39)

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都是分裂主义的罪魁

薛 迅

中央两报一刊最近发表的重要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并且用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要认真注意和警惕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破坏党的团结的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深刻地指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这个历史的教训不少。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都给党的团结和统一造成很大的危害。”

陈独秀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贯彻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压制和排斥党内的正确意见，助长和纵容了反革命势力，使蒋介石这伙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獗起来。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指出国民党右派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毛主席还以“叶公好龙”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

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则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阶级本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击中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要害。这时，陈独秀就利用职权，横加压制，不准党的机关刊物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这种专横跋扈的家长作风，激起了全党的反对。可是陈独秀依然一意孤行，凡与他意见相违背的，即摆出一副“老头子”的架势，动辄进行训斥，破口大骂。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把这种地主、资产阶级恶劣的专制作风搬到党里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陈独秀的阶级本性的暴露和表现。

瞿秋白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以后，为了积极推行他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竟然采取组织手段，在党内强行贯彻。凡违背其盲动主义意图的，他就滥用职权，加以惩罚，把不愿执行盲动主义计划的都放在处分之一列，先后有许多同志因此遭到各种不应有的处分。

这种家长制和惩办主义的恶劣作风，到了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更加恶性泛滥起来。李立三这个老机会主义者曾经供认：“我们禁止自我批评，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当时，李立三把持党中央的领导权，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下达的指示，不论对与不对，下级只能百分之百的执行，不得有任何异议。为了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他就用所谓“总行动委员会”取代党的领导。他可以不问时间条件，布置城市总暴动，强令下级执行。这种错误的组织路线，在当时受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严正批判，但是这条错误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未能肃清，因而又被以后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利用并加以发展，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总结了历史教训，

指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

叛徒王明是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上台的。为了推行他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在组织路线上任人唯亲，实行宗派主义，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按照他的路线“改造了各级党与团的领导机关”，“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从而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他经常发指示，出“训令”，“钦差大臣”满天飞，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对于反对他的错误路线的，动辄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的无情的斗争”，动用所谓“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残酷无情的自我批评的武器”给以惩办。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手段，指出：“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王明就是用这种恶劣手段，到处推行其错误路线。结果，使我党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与此同时，党内又出现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党及时粉碎了他的罪恶阴谋。

刘少奇一类骗子在组织上都是以国民党特务、托派、叛徒、工贼为基本队伍，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凑集了资产阶级地下司令部，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庭抗礼。他们惯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种形“左”实右的手法，来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刘少奇散布“斗干部就是斗地主，整党就是

整地主”等谬论，用所谓“搬石头”的手段，无情打击广大党员干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四清”运动中，他又鼓吹“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问题，不可相信。不论干部的好坏先斗几次再说”，从而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又立即派出工作组，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主张对各级干部一概打倒。毛主席指出：“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样干，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统统都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表现。他们“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在他们眼里，党不过是达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他们这种机会主义路线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种特点，反映在组织上，那就是在党内搞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实行封建式的家长统治，把党员和群众当作他们的奴隶，严重地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尽管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大搞宗派、大闹分裂，然而他们都没有能搞垮我们党。相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党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们，战胜了他们，并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但是，阶级斗争还是会继续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决不会停止，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还会出现。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大胜利！

（载1971年12月13日《文汇报》）

陈独秀右倾分裂阴谋的破产

史 锋

陈独秀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八七九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五四运动时期，他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被推选为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用“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革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他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终于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不仅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且还以家长制的作风，横加压制，坚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他千方百计地压制工农运动，并且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解除

武装。结果，造成了革命的失败，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毛主席指出：“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教育了很多犯过错误的人。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撤了陈独秀的职。一九二八年党召开了“六大”，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时，陈独秀拒绝参加“六大”，并大搞分裂活动。他又不断向党挑起论战，接二连三地向党的中央机关写信，坚持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鼓吹托洛茨基主义。在党中央还没有决定对他的信进行答复之前，他就将自己给中央的信进行公开宣扬，并且和曾经积极推行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彭述之等人勾结起来，组织秘密小集团，煽动党员起来反党。他和苏联党内的托洛茨基一样，“从派别活动的政策进到直接分裂的政策，进到建立新党的政策”。

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人组织了“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了托派组织的刘仁静，特地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拜访了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也组织了“十月社”，发行《十月》杂志，进行托派活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以后，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和其他托派分子正式勾结起来，组成托陈取消派，即所谓“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他们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在上海设立了中

央机关，出版刊物叫《火花》。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是这个组织的头子。

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就是托陈取消派的纲领。在这个“意见书”中，陈独秀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反诬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又咒骂党的“八七”会议后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是“杀人放火”的象征，攻击党的组织路线是“厉行官僚主义”。

他们的“意见书”，提出了托派的观点，认为中国早已不存在封建主义，并且不顾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封建剥削关系占显然优势的事实，硬说“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他们又抓住了社会生产与生活上的一些表面现象，说中国“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因此“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已经“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

他们更无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镇压了革命的事实，否认中国革命仍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宣称“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政权”，“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这种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就是他们的“二次革命论”。

他们既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要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后再搞，因此，在“现阶段”，是“没有革命局势”。怎么办呢？就是不准革命，“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一句

话，就是为蒋介石的血腥统治装饰门面。这就完全暴露了他们取消革命的真面目。

这个“意见书”最后还鼓吹“在国际左派反对派（按：即托洛茨基反革命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并且提出要召回托洛茨基，“恢复”他的领导工作，又提出要“恢复”中国共产党内被开除的人的党籍，企图为国际国内的所有反党分子翻案。

但是，陈独秀一伙的分裂活动，并没有使我们党分裂，相反使他们这一小撮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的取消革命的叫嚷，也没有使革命停止下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红色根据地日益发展。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等接受托洛茨基“不妨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要“在中国造成日本进攻借口的事件”的指令，干着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勾当，完全堕落成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匪帮，一个个投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陈独秀一九四二年死于四川江津，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载1972年3月27日《文汇报》）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 可耻失败

史正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开始了它的残酷统治。他们对外进一步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更加疯狂

地镇压革命运动，开展了血腥的大屠杀。工农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革命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一天天加深，因此，革命的高潮必然还是要到来的，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明论断，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接着又创立了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毛主席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的这条正确的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出来的，而是同机会主义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形成了以瞿秋白为头子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并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是处于低潮时期，提出了所谓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谬论。他们不作调查研

究，凭主观臆测和一些表面现象来分析形势。他们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各地武装起义有汇合成为全国工农民众总暴动，一举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趋势；同时又任意夸大敌人之间的内部矛盾，称“广州暴动之后，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更加分崩离析”，“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最近江西农民暴动区域，有整连的兵士投到农民方面来”，“一般兵士的骚动与倒戈，已经时常听见”，甚至把敌人的疯狂镇压，都作为革命潮流高涨的证明。由于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因此必然导致策略上的错误：反对革命的暂时退却，要求盲目的“进攻”，并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不顾条件是否具备而普遍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特别是他们醉心于城市工人的暴动，认为“城市暴动”是“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农村中四处锋起暴动的环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动便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竭力推行他的盲动主义路线，使革命受到了损失。

在对待革命性质的问题上，瞿秋白制造了一种反动的机会主义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从“左”的方面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说什么“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和区别，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则。瞿秋白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把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列入了革命对象，没收他们的企业和财产。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提出“一切工厂归工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一系列极“左”政

策和行动计划，把小资产阶级赶向敌人一边。

毛主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瞿秋白脱离了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而搞所谓“暴动”，这就把我们积蓄的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屠刀之下，结果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力量，又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任何什么“高涨”、“无间断的革命”、“武装暴动”等等漂亮的词句，都掩盖不了这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本质。

为了推行这条错误路线，瞿秋白和其它机会主义者一样，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他们对持有不同意见和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进行排挤和打击。他们对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明论断，十分恼火，甚至利用他们当时窃取的职权，排挤和打击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是，卑鄙的伎俩并不能使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阴谋得逞。各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必然会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坚决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开始就受到了毛主席的坚决抵制，也受到了在白区工作的许多同志的反对，实际上在一九二八年初，许多地方已经停止执行，到了同年四月，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也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为国民党军队所捕，在狱中，他抛出了一份名为《多余的话》的自首书，再三向反动派表示“忏悔”、“自新”，把参加革命活动说成

是“历史的误会”，说参加共产党和做党的工作是“不幸”，“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并且声言，“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在自首书里，瞿秋白泄露了从大革命失败以来至被捕时党内的军事机密和组织情况。为了活命，他还对革命表示“万分的厌倦”，胡说什么“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要“永久休息”，等等；并向反动派求饶，保证今后“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封自首书先后被登载在国民党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和《逸经》等反动杂志上。瞿秋白这种自首叛变的卑劣行径，并没有得到敌人的饶恕，结果还是被国民党枪杀于福建长汀。

（载1972年3月31日《文汇报》）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破产

郑 滨

一九三〇年初，我们党在战胜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以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已遍布全国十几个省，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得到相当的恢复。但是，党内一部分同志片面估计当时的形势，产生了骄傲情绪，以至发展为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

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

在一九二八年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他先后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等抛出了《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文章，散布了一系列的“左”倾观点。一九三〇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李立三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反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方针，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认为当时已具备在全国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条件。李立三认为，全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已处于动摇与崩溃之势，他们正在“作最后的挣扎”；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全国各地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的向前发展。因此，只要“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须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成为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李立三还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在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必然引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世界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后决战的高潮马上会到来。由于他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对毛主席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恨之入骨，看作是他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胡说什么“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